

千利休：一个美丽的文化传说

张建立

刊载于《知日·日本禅》，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4 月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者，其可谓非常之奸雄；举天下人而誉之者，其可谓天下之豪杰。综览关于日本茶人千利休的传记、论说，虽众说纷纭，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但总体来看，千利休可谓是举天下人而誉之的风流倜傥且刚毅卓尔的文化豪杰。

历史研究探讨的真实，文化理想向往的当然，有时几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很难做到一致相符。在我看来，无论是文献论说，还是口承相传，千利休的形象，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美丽的文化传说；其所要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历代茶道修习者们向往的文化理想的寄托。

《知日》创刊之宗旨，既然是想为兼具新知探索和思考力的华文年轻一代提供最有创意、最具价值感的深度日本文化阅读，那么，关于千利休的评说，就应该既要留意历史的真实，又能兼顾茶道修习者们向往的文化理想。

千利休是日本茶道之集大成者吗

留意历史的真实，首先就要弄清楚千利休的生平，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千利休真的是日本茶道之集大成者吗？

据千利休的曾孙日本茶道表千家第四家元江岑宗左的《千利休由绪书》等资料所述，千利休本是出生于日本和泉国堺（即现在的日本大阪府堺市）的一个小渔翁，一个海鲜产品的批发商，本姓田中，幼名与四郎。其祖父名叫田中千阿弥，其父名叫田中与兵卫。不知何故，其父后来取其祖父名中的“千”字为姓，改称千与兵卫，于是田中与四郎，也便改称千与四郎。但是，田中与兵卫何时改姓“千”，则缺乏史料佐证，今天已经无从考察。“宗易”是千与四郎的法讳，“利休”乃千与四郎的法号，但究竟是由谁、何时、何地授予千与四郎“宗易”的法讳与“利休”的法号，至今亦没有定论。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千与四郎的“宗易”法讳与“利休”法号皆与大德禅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至少可以说明千与四郎参禅修道颇有成就。后世直至今天，人们多习惯称“千利休”，大多数的人甚至已经不了解其名字还有这多曲折与尚未破解的谜底。

千利休的生日不明，生年也是从其卒年倒推出来的。天正十九年（1591 年），发生了大德寺山门木像事件（这尊木像现在祭奉于今日庵的祖堂）。该事件，成为直接原因，同年 2 月 28 日，千利休被丰臣秀吉赐死，千利休在被迫剖腹自杀时，作了一首遗言偈语，简译如下：

人生七十只一喝

祖佛共杀无苦乐

如意剑刀向天抛

心无挂碍真快活

人们根据千利休这首辞世遗偈中“人生七十”一语，判断千利休卒年应为七十岁，由此倒推其生年应该为大永二年（1522 年）。

千利休自幼因家道殷实，故有余力习茶，年纪轻轻就在茶道方面获得美誉，据著名的、但却被历史学家们存疑的茶会记《松屋会记》记载，千利休十七岁时就已经能够独立开办茶会，早早地就跨入了著名茶人的交际圈中。16 世纪中叶以后的茶书中，有关千利休的记述越来越多，加之最后千利休被当时的权贵丰臣秀吉赐死，这一悲壮的人生结局或多或少地也加深了人们对千利休文化豪杰形象的认同。以至于今日，包括很多中国学者在内的众多日本文化研究专家们，也都一致认为“茶道”是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它创始于村田珠光，经武野绍鸥，集大成于千利休。

这种“茶道”发展史共识的根据，最初来源于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在该书开篇部分有如下一段话：

宗易（千利休）说：珠光有两个弟子，叫宗陈和宗悟，绍鸥就是师从这二人修行茶之汤的。宗易的师傅也不仅是绍鸥一个人。能阿弥的侍从中有个叫右京的人，壮年时，跟随能阿弥习茶，但后来退隐到堺居住，名号空海。在同一个地方有个叫道陈的隐者，二人情投意合，经常在一起交流，空海就把茶道详细地传授给了道陈，而道陈和绍鸥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经常一起就茶进行研修切磋。宗易当时名叫与四郎，从 17 岁时就格外喜好茶，起初跟随道陈习茶，后经道陈引荐成为绍鸥的弟子。

这段话记述了日本茶道的两条发展脉络：一个是以侍奉幕府将军的能阿弥为首的贵族

茶，其传承系谱是能阿弥→右京（空海）→道陈→千利休；一个是以珠光为首的庶民草庵茶，其传承系谱是珠光→宗陈和宗悟→绍鸥→千利休。这两条发展脉络，都是在千利休这里汇合，因此才有了千利休乃日本茶道集大成者之说。恰是被奉为集大成者的千利休将村田珠光奉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所以，后世习茶者们便因袭此说，不求甚解的后学也跟着以讹传讹，于是才形成了今天这种所谓的“茶道”发展史“共识”。

但是，这种所谓的“茶道”发展史“共识”并不可信，理由如下：首先，如著名的日本历史学家、茶道研究家桑田忠亲、西山松之助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被茶人们视为日本茶道圣典的《南方录》于17世纪后期方才问世，书中记载的很多内容明显不属于千利休所生活的时代。对于那些无法判断真伪的内容，究竟有多少是千利休所为，至今尚没有谁能说得清楚。

其次，关于所谓的“茶道”开山鼻祖村田珠光，其身世也一直是个谜，著名的日本历史学家、茶道研究家永岛福太郎（1912年—2008年）先生终其一生也未能用史料来确证这个人物的事迹。而且，就连“茶道”一词开始见诸于日本的相关文献，也都是17世纪中后期的事了，此前及其后乃至今天，人们在称谓独具日本特色的茶文化时，更习惯使用的是“茶之汤”或“侘茶”这种称呼，而非“茶道”。虽然很多学者都称“茶道”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但其独特之处何在，却又语焉不详。

日本茶道的特色之一，是它的时空观。千利休之孙千宗旦，通过创建“又隐”茶室，再现了千利休的四张半榻榻米茶室的风貌，正保三年（1646年），作为侘茶的终极境界之相，又在宅邸内建了一个只有一又四分之三榻榻米大小的茶室“今日庵”，也就是说，想要建比“今日庵”再小的茶室已经不可能了。宗旦以极致之美，展现和继承了千利休的道统。因此，日本茶道修习和研究大家户田宗安就曾据此指出，千利休之孙千宗旦才是日本茶道真正的集大成者。

利休茶道的精神

纠结于历史的真实，虽然也不乏发现的快乐，但往往也会带给人很多莫名的失落感，情不自禁地感慨怎么会是这样？！为了弥补历史真实的缺憾，我们还是多用些笔墨，来梳理一下历代茶人们在“茶禅一味”的理念下演绎塑造的、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利休形象吧。

天下名山僧多占，自古高僧爱品茶。佛教与茶因缘深长，在日本茶道发展史上，佛教的作用功不可没。没有佛教僧侣传茶，没有寺院茶园，日本茶道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也就更谈不上对人的生物性需求的基本满足；没有佛教特别是其中的禅的影响，日本茶道恐怕就不会发展成为介于世俗生活与宗教之间的综合性生活文化，也就难以被提升到“道”的精神高度，日本茶道修习者欲藉此获得社会性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满足也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关于千利休茶道的精神，茶人们有很多的演绎，最为简洁、经典的概括是“七则”、“四规”。

所谓“七则”，即传说千利休为茶人们制定的如下七条茶道法则：

茶要点得合口；

炭要放得能烧开水；

茶花要插得如同开在原野中；

做茶事要能使人感到夏凉冬暖；

凡事应未雨绸缪；

关怀同席的客人；

赴约要守时。

这七条茶道的法则，是千利休回答别人提问时给出的答案。据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记载，曾经有人问千利休：“茶之汤都有些什么样的秘事？”千利休便做了如上的回答。那个人听了千利休的这番回答后，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算作秘事的，都是一些理所当然、极其自然的事情，所以非常不服气地说：“如果就这点事情的话，那我早就清楚，无须问你了。”于是，千利休回答说：“那好吧，现在你就按照我刚讲的那样来招待我吧。如果你做到了这些要求，就让我做你的弟子吧。”

当时，在场听到了这番话的紫野大德寺的笑岭和尚评价说：“利休的回答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如同过去鸟巢禅师对白乐天所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样，不做一切恶事，尽力去做一切善事，这样的道理虽然连小孩子都懂，但即便是 80 岁的老人，想要完完全全地做到这一点，也实非易事。”

那么，具体怎样做才能达到上述七条法则的要求呢？可以说，日本茶道的所有点茶方法都是为了训练茶人们达到此境地而设的，日常习茶，体味“七则”之境界，禅语中常常提到的“春来草自生”、“云静日月正”、“水自茫茫花自红”等等的境界，就宛如蓝天上的白云，于胸中悠然去来，惬意无限，但因此文篇幅所限，就无法对读者诸君一一述说了，感兴趣者，

无妨去亲自学习体验一番，此中真趣自知。

所谓“四规”，即“和、敬、清、寂”，此可谓对茶道精神最简约的概括。

为了使人明白这是四种茶道理念，我们一般习惯将其分开来书写成“和、敬、清、寂”，但我的师傅里千家第十五代家元千玄室先生则主张，不应将“和、敬、清、寂”这样切割开来理解，而应该是“和敬清寂”这样连在一起来讲，以互和、互敬和清净的心去创造不为物动的信念。简言之，人生一切妙境全在此言中。虽然“和敬清寂”的实践的确是人道上必不可缺的东西，但在实践过程中，真想凡事做到“和敬清寂”却是非常不容易的。大而言之，实现世界的和平也是如此，不在于互相的争论，而完全取决于各自的“和敬清寂”的实践。

简约虽美，但往往又因过于抽象，而令人难以真正把握。所谓诗歌言志，《南方录》这本书中，曾特意例举了两首和歌来表达利休茶道的最高精神境界。

据《南方录》记载，千利休的老师武野绍鸥喜欢用《新古今和歌集》中收录的藤原定家的和歌，来表达其所体悟的茶道精神境界，简译如下：

不见春花美

亦无红叶艳

唯有秋暮下

海滨小茅庵

晚秋时节，不见春花美，亦无红叶艳，唯有连绵的芒草随着海风起伏荡漾。绍鸥向此中寻求茶道的境界，认为这种枯萎萧杀的大自然风情，才是真正的“侘”的世界。

千利休则在该首和歌中所表述的境界的基础上，援引藤原家隆的如下和歌，希望努力摆脱藤原定家一味阐发的消极世界，转向积极肯定、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

苦待花报春

莫若觅山间

雪下青青草

春意早盎然

千利休认为唯有两首和歌之心珠联璧合，才能完完全全地表达“寂”的心境，特别是后者才是茶道所当追求的最高最美的境界。

冬去春来，世人只关心那里的山、这里的森林之花何时开，只追求它们的美。天气转暖，

和煦的阳气虽说能够让人身心放松，但远山之巅尚且白雪皑皑，山村中依旧留有冬天的残雪。尽管如此，在雪下，草儿已经萌生出了嫩嫩的新芽。在无言的一草一木中，也充满了坚忍地熬过了严冬考验的自豪和矫健。那是一种一阳来复，蕴涵着无限可能性的清寂的境界，这才是利休茶道所独具的意境。

正如千玄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千利休所推崇的和歌，还是绍鸥所推崇的和歌，描述的同样都是“不见春花美，亦无红叶艳”的清寂场景，寂寞的山村和海边小茅庵也是同样的处境。但是，比较而言，晚秋所至之处是阴之极，而雪下青草之春却是即将萌动的阳之始。看似只隔一张纸、背对背的距离，实际上却是天壤之隔的两极。千利休认为不能兼具这两极，茶道则无以立。千利休的胸襟之大，简直难以言喻。茶道就是阔步于这广袤空间的大道，这是一条看不到顶，也不知尽头的无限深远的大道。只有自己主动去拜师，寻求安心立命之所，舍身忘我地去修行，去实践，唯此才可入道。它非艺亦非术，它是我们自身构筑起来的道本身。欣赏春花之美是谁都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但我们必须还要拥有能够发现雪间青草之美的敏感，由此把握“侘寂”之心，认真体悟茶道两极的精神佳境。

千利休的道歌

为了有助于读者对千利休的理解，最后还是简介一下传由千利休所写的和歌吧。最有名的便是脍炙人口的《利休百首》。其内容，从茶道精神，到具体的点茶方法，可谓是包罗万象。不过，虽名为百首，只是取其概数而已。有的文献也将其称之为《绍鸥百首》，无论将这些和歌的作者归于武野绍鸥和千利休师徒哪个人的名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恰如日本茶道里千家第十四代家元在《茶道教谕百首和歌》“解题”中所指出的那样，其中或许确实有武野绍鸥或千利休撰写的和歌，但说全由其个人所撰写则有些言过其实，客观地讲应该是后世茶人将传说为武野绍鸥或千利休撰写的和歌编辑而成。具体内容，感兴趣者可以查阅《日本茶道古典全集》第十卷中收录的《茶道教谕百首和歌》，在此，笔者仅想为大家介绍一首我在修习茶道时常听茶道家元等传讲的千利休作的茶道和歌，简译如下：

寒热地狱间

柄勺往来转

悉听茶人便

无心无苦怨

这是一首咏茶道柄勺以言志的和歌。柄勺，在茶道点茶过程中是专门用于舀沸腾的开水和凉水的茶道具，所以才有“寒热地狱间，柄勺往来转”之说。柄勺无言，它自身什么都不会讲，而且经常有陌生人来使用它，无论柄勺心中好恶如何，刚刚被用来从沸腾的釜中舀完开水，马上又会被按到清水罐中舀凉水，但柄勺却能够做到一切任人驱使，任劳任怨，坦诚面对，所以才有“悉听茶人便，无心无苦怨”的评语。这首和歌取意于《碧岩录》第四十三则中的禅语：“寒时寒杀阇梨，热时热杀阇梨。”因此，和歌中所谓“无心”，即抛却一知半解、冠冕堂皇的偏狭之心，抛却妄想，抛却我执、我欲的境界。如果能变得无心，也就无所谓寒热了，而唯有像柄勺那样完全进入自己此时此地的角色，方能无心渡世。此歌谕示茶人们，人生于世，当直面人生，不虚伪造作，不装腔作势、莫名其妙地做出一副似有所悟的样子，有过无耽改，随时随处做主，宾主历然，宾主一如……，此歌中究竟蕴含着多少禅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愚者见愚，既值得失意者省思，也可供得意者玩味。

诸如此类，蕴含了无限禅机的茶道和歌及茶道故事还有很多，但笔者在此想提请读者诸君注意的一点是，的确，恰如“茶禅一味”一语脍炙人口所示，禅对茶的影响，无论从茶道精神内涵，还是从点茶礼仪上看，都可谓至深至广，但如果认为千利休能够被人们推崇为茶道的集大成者，仅是因为其汲取了禅的营养，则对千利休的评价未免显得过于单调粗糙了。日本著名的镇西大社諏访神社宫司、茶道研究家上杉千乡就曾指出，当把日本茶道中佛教的要素剥离之后就会发现，人侍奉人的茶事，其实就是将人供神的神事仪礼，以最为庄严的形式予以继承并系统化了的仪礼，茶事就是祭礼本身；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也反复论述过道教对茶道精神的影响；关根秀治博士近期在日本茶道杂志《淡交》连载的文章中更是提出了“儒茶一味”的观点。也就是说，日本茶道的精神不仅仅源于佛教，她融道教、阴阳道、儒教、佛教、神道、基督教思想为一体，分别表现于建筑、庭园、书画、陶瓷器、竹器、漆器、插花、香道、烹饪、礼仪、点茶方法等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上分三部分，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了一个接近于真实的千利休和一个茶人们向往的千利休。

比较真实的千利休，可以说首先是一个精明风雅的商人，在那个身份等级制度极其严格、商人地位卑微的时代，千利休能够从诸多依附权贵的茶人中脱颖而出，独伴君侧，恐怕他凭的不仅仅是其在茶道方面卓然不群的才艺，至少说明他也是一个非常会表现自己和经营自

己的人，然而，高处不胜寒，伴君如伴虎，最终赢得一个被赐死的结局，不能不令人惋惜。不过，在那种只有武士才配赐死剖腹自杀的年代，千利休的死固然谈不上虽死犹荣，但一个本来地位卑微的人可以获得一种身份高贵的武士的死法，至少也可以说是非常体面的了。另外，千利休死后，很多大名武士冒着被惩戒或者说是生命的危险呵护其后人，并为千家再兴而奔波，从这些人情来看，千利休的确又可谓是一个好交广施深得人们敬重的性情中人。

与此相对，一个茶人们向往的千利休，则是一个毫无世俗之气的人，俨然一个学贯古今中西的文化巨匠，他对所有世间哲理都有深刻的领悟，他为人们指明了理想的社会生活的方向，他为茶人们制订了坚持至今的“七则”“四规”，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演绎成脱俗不凡的风雅范本，这样的传闻有很多，其中，茶书《茶话指月集中》记载的丰臣秀吉与千利休关于茶花的轶闻，就比较有名。

轶闻之一，讲的是梅花。据该书记载，某年春天，丰臣秀吉想难为千利休，特意弄来一个特大个的扁平铁钵花器，摆放在茶室的壁龛中，铁钵花器里面注满了清水，在铁钵花器旁边放了一支红梅，要千利休来插花。一旁伺候的下人们，都觉得这回千利休可能要难堪了。但是，再看千利休，来到花器近旁，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取过来梅花枝，将梅花瓣轻轻地摘下洒落在盛满清水的铁钵花器里，然后将梅花枝横放在铁钵之上，那种落花流水的感觉，那种横斜苍劲以及傲然不羁的感觉，着实令人感动不已。这其实是把一个静的物体——梅花枝，变成了一种动态人生的写意。

轶闻之二，讲的是牵牛花。据该书记载，某年春天，有人告诉丰臣秀吉千利休家中的牵牛花开了，争相竞艳，十分美丽。丰臣秀吉听说后，兴致昂然地通知千利休要前往观赏牵牛花。千利休于是便决定举办一次早晨的茶事，来邀请丰臣秀吉观赏牵牛花。茶事当天早上，满怀期待的丰臣秀吉来到千利休家，待走过茶庭时，却看不到一朵牵牛花，满篱笆的牵牛花已经被齐刷刷地剪掉了，只剩下一片绿色的藤叶。臣秀吉心里不觉大怒：你千利休居然敢跟我对着干，知道我专门来看牵牛花，你竟然故意把花全剪掉了！

千利休按照礼节迎出门来，丰臣秀吉按捺住愤怒，进了千利休的茶室。

进了茶室，丰臣秀吉瞬间惊呆了：他看见在幽暗的茶室中，一朵洁白的牵牛花宛如在目。茶庭里牵牛花的确不见了，但茶室里用来插花的花瓶里正插一朵雪白的牵牛花，那一朵雪白的花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它那无言凄艳之美的震撼力，远远胜过整个茶庭密密麻麻的一大片牵牛花。这就是千利休展现牵牛花的美丽的惊人手法。这个故事千古流传，使后世茶人一般不敢轻易再用牵牛花作为茶花了，而且，茶庭里也不再种各类的花。

上述两则轶闻中，关于梅花的故事略显平淡，但关于牵牛花的故事，现在仍常常会在不

同的场合听到茶道老师们津津有味地一遍又一遍地向弟子们讲述。我本人也是一个修习茶道近 20 年的俗人，在感叹千利休的智慧的同时，也常常情不自禁地胡思乱想，那残存于茶室壁龕花瓶的牵牛花若有灵亦当悲戚吧，众多同伴皆被杀戮，惟留其一朵来敬奉暴虐的君王，用现代人时髦的话讲，难道这就是茶道该追求的真善美吗？为何茶人们不愿关注思考千利休插花手法中这一层面的内容呢？利休“七则”之一是“茶花要插得如同开在原野中”，对于这一条法则，我至今还没有能很好地领悟。

茶人们不仅仅是将千利休的一举一动都演绎成脱俗不凡的风雅范本，就连他的死也被解释成是因为丰臣秀吉嫉妒他的才华所致。且不说在后世流传的关于千利休死因的不同版本了，单是其木像被立于大德寺山门之上，在那样一个身份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其实就已经足够被杀头的了，因为作为一个臣民，虽是木像，但你立于大德寺山门之上，则无异于让上至天皇将军下至普通百姓所有要进出这个大德寺山门的人都得从你的胯下钻过，就凭这份傲气或许也该杀。顺便提一句，大德寺为千利休立木像于山门之上，并非是因其在茶道方面具有卓尔不群的才华，而是因为这座山门——金毛阁是千利休本人向大德寺捐献的，大德寺为了感谢施主，才在金毛阁上安置了一座利休的木像，没想到弄巧成拙，却为千利休招致杀身之祸。

总之，茶人们对千利休的向往之心是真真切切的，但由那颗向往之心推演出的千利休的形象却未必都是真的。因此，在笔者看来，千利休的形象，更像是一个美丽的文化传说。